

香港墳場

香港墳場，俗稱跑馬地墳場，位於跑馬地黃泥涌道，跑馬地馬場對面。1841年1月26日，英軍在登陸香港島的翌日，便宣佈正式接管港島，這是在英國割佔港島取得法理根據的《南京條約》簽訂的年半以前。

開埠伊始，雖然前途未卜，但臨時政府須馬上處理兩個急不容緩的問題：其一是如何安頓從澳門遷來的西人及從大陸來港謀生的華人，其二是覓地埋葬在香港染病死去的英軍。遠道而來參與鴉片戰爭的英軍，因無法適應香港炎熱潮濕的天氣，加上本地瘧疾猖獗，故死亡率極高。開闢墳場以埋葬死者成為當務之急。

一直以來，我們相信港島最早的墳場原設於灣仔現在星街、月街一帶山坡，其旁是撥與天主教會用以安葬愛爾蘭裔軍人的天主教墳場。然而，愛德華·克里醫生 (Dr. Edward Cree) 的日記及水彩素描，卻為香港第一個墳場設於何處的問題提供了另一個答案。克里醫生在1841年6月18日的日記中提到“響尾蛇號”艦艦長布羅迪 (William Brodie) 的遺體於下午被安葬於香港的新墳場 - “快活谷”中。

從克里醫生所繪畫的水彩畫中可見到布氏的棺柩及送殯行

列徐徐步入一個群山環繞的山谷，地勢與跑馬地脗合。這說明了跑馬地的香港墳場（前稱殖民地墳場或基督教墳場）自開埠之始便設立，而快活谷之命名，顯然是與關設的墳場有關，而與賽馬無涉。該墳場的土地在1841年已有人安葬，首位使用者是本傑明·福克斯海軍上尉。1845年該墳場才正式開放，為香港開埠早期成立的墳場之一。早年埋葬該處的都是英國人及日本人，直到1913年才有華人。由於埋葬於此墳場多是基督教信徒及外籍人士居多，又稱為紅毛墳場。

開埠後，來港華人與日俱增，但在1840年代，來港的十之八九為勞工，從事各種體力勞動，如苦力、打石、建築，或當小販等。他們大多是隻身來港謀生計，而且流動性強。在1850年代後，在珠三角鄰近地區爆發的紅兵之亂、土客之爭，繼而是二次鴉片戰爭中，廣州商館被焚，一批批商人及買辦攜帶資金移居香港，或從事南北行出入口生意，或繼續充當洋行買辦，香港的商業發展起來，而華人社會亦日趨成熟。

隨著華人人口的增加，港府開始關注華人的殯葬問題。1856年6月，港府通過了一條規控香港華人殯葬及遏止滋擾法例，正式立例規管華人殯葬，其後數年更陸續闢出若干地方予華人安葬及作出種種規限。可知在1856年以前，客死香港的華人，大多是身無長物的勞工，往往被草草埋於山邊，或由所屬同鄉

會集中處理，設立義塚以資安葬。然而，隨著 人口增加，城市的拓展，政府須開闢土地以興建房屋，須把山邊墳地清走。故須立例規管華人之殯葬。

東華醫院所在地便原為亂葬崗，東華醫院興建時，把這些遺骨搬到牛房義山，其後再遷往和合石，踏入 20 世紀後，隨著愈來愈多華人富商在香港落地生根，要求一塊土地讓他們在百年歸老後永久安葬的呼聲愈來愈高，就此問題，當時已接管香港墳場的潔淨局中有不少討論，其中華人代表劉鑄伯多次據理力爭，他指出香港墳場既然由公帑維持，應容許非信奉基督教的華人入葬，

在龐大的輿論壓力下，港府在 1909 年通過基督教墳場條例，把香港墳場一較偏僻角落定為非基督徒下葬區，而其他部分劃定為基督徒墓葬區，並由聖公會主教祝聖土地。經過劉鑄伯等華人代表多年努力爭取，政府終於 1913 年批出香港仔山地作為華人永遠墳場，自此落地生根而又沒有改信基督教或天主教的華人富商，大多安葬於此，更有把先人骨殖從家鄉運此下葬的，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乃成為香港世家大族的主要家族墓地。反觀下葬香港墳場的華人數目不多。當然也有例外的，一代巨富何東選擇在離世前入教，得以和早前去世的夫人麥秀英一起，安葬香港墳場；銀行界巨擘簡東浦也選擇了香港墳場為埋骨之

所。

作為一個公眾墳場，原則上不同種族及宗教人士均可入葬，在 1909 年的條例通過時，便指定聶斯脫利派（景教）、亞美尼亞教派、東正教及入了共濟會的天主教徒均可葬在已祝聖的土地上。其中亞美尼亞人均信奉東正教之一支派 - 亞美尼亞東正教，查亞美尼亞人自祖國淪亡後，多居於印度的加爾各答，19 世紀時，不少亞美尼亞人隨英國人到東南亞發展，來香港從商的亞美尼亞人較少，故沒有獨立的教堂；亞美尼亞裔的遮打定居本港後一直在聖公會的教堂做禮拜，去世後便葬於香港墳場。

香港墳場靠南山坡有 465 個日本人墳墓，是香港唯一的日本人墳場，也是日本人早年在香港活動的見證。從 1878 年開始，在港去世的日本

人或葬於咖啡園墳場，或零星的葬於香港墳場，與基督徒的墳墓混雜一起。隨著日人墓穴的增加，英國人對於他們的拜祭儀式，特別是焚香深表不滿，經過潔淨局及立法局的一番討論，終在 1909 年通過條例，把墳場一角，闢作非基督徒墓地，爭議告一段落。



在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撤銷了國民渡航海外禁令，特別是在 1902 年《英日同盟》結成後，來港日本人日漸增多。日本人在港經營服裝店、美容院、照相館、飯店、旅館、診所等，但為數最多的是賣來香港當娼妓的日本女子。

香港墳場與香港以至中國近代歷史息息相關，這裏有參與第一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陣亡英軍，有染上疫病死去的駐港英軍及其家屬；有開埠初年的港府要員、千里迢迢來華傳播福音的傳教士、近代革命之父孫中山先生的師友、第一批皈依基督的華人，及對香港的建設作出卓越貢獻的不同國籍的人。

香港墳場教堂建於 1845 年，與香港墳場成立時間相同，是香港現存最古老的教堂。教堂為一座單層建築，尖拱的門窗及正方形的裝飾線條均反映出其都鐸復興式建築風格。教堂已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



本傑明·福克斯海軍上尉 (1812 – 1841) Lieutenant Benjamin Fox

本傑明·福克斯上尉的塋墓，是目下已知香港墳場內年代最早的塋墓。本傑明·福克斯上尉是在 1841 年 5 月 25 日攻打廣

州時陣亡的。查英人於 1841 年 1 月 25 日登陸並佔領香港島，未幾戰事重啟，英軍於 5 月 14 日攻陷虎門砲台，溯江而上，兵臨廣州城下，從珠江江面向岸上發炮，另外派遣軍隊登陸直趨城北，奪取越秀山高地，“寧羅德” (HMS Nimrod) 號艦的本傑明·福克斯上尉在 5 月 25 日參與攻城時被炮彈打中，翌日因傷死去。



響尾蛇號艦的克里軍醫在其日記中描述：“夜間，(廣州)城的濃煙及炮彈橫飛照亮夜空 ----收到很多傷亡報告，敵軍更是傷亡慘重。可憐的本傑明·福斯克，‘寧羅德’號的首席上尉的腳被炸碎，因傷重斃命。”本傑明·福克斯的墓碑上刻上：“紀念本傑明·福克斯上尉，29 歲，‘寧羅德’(HMS Nimrod) 號上已故上尉，於 1841 年 5 月 25 日攻打廣州城之際高地被殺”。

威廉·布羅迪艦長 (1785 – 1841) Commander William Brodie

威廉·布羅迪的墓，是目前香港墳場最早的塋墓之一。威廉·布羅迪，蘇格蘭人，早年英國皇海軍響尾蛇號 (HMS

Rattlesnake)之艦長，響尾蛇號是

一艘運兵船，約 600 噸。1839

年 9 月，響尾蛇號離開其寄碇

港樸茨茅夫，駛往中國，投入

第一次鴉片戰爭。響尾蛇號抵

華後，先後參與了 1840 年 7 月

的侵佔定海、1841 年 3 月及 5 月二次進犯廣州的戰役。6 月

14 日，該艦駛回香港，船上有近一半人染病。威廉.布羅迪也

因病不起。軍醫克里在 1841 年 6 月 18 日的日記上寫上：“

可憐的老布羅迪在下午葬於香港快活谷的新墓地。

布羅迪的墓碑上刻：“紀念威廉.布羅迪，皇家海軍之軍官

及“響尾蛇號”兵船之艦長，1841 年 6 月 17 日終於香港，

享年 56 歲。由其同袍及參與 1841 年中國戰役的部隊所立石，

以表達對亡者的尊敬及愛戴。”

“皋華麗”號官兵紀念碑 Monument to the Officers of HMS Cornwallis

在香港墳場內芸芸的第一次鴉片戰爭紀念碑中，以此碑最具歷史價值。“皋華麗”號是鴉片戰爭中英國遠征軍艦隊的旗艦，它載重 1,890 噸，1813 年興建於印度孟買船塢。參與過鴉片戰爭後階段的數場戰役，1842 年 6 月艦隊從長江口上駛吳



淞、鎮江，最後寄碇於南京城外的長江江

面。1842 年 8 月 29 日，中英雙方官員

在“皋華麗”號的船艙內簽署了我國

第一條不平等條約 - 《南京條約》。

英方以璞鼎查代表，而中方代表是

耆英及伊里布。南京條約第三條規定

把香港割讓與英國。本紀念碑正面上刻

上“本碑乃‘皋華麗’號艦上官兵及遠

征軍長官所立”。另一面刻上三個死者的名字，根據文獻記載，

其中海軍上尉林伊特乃於吳淞陣亡，昂艾基少校則於鎮江附近

中暑死去，阿徹利上尉死於長江，死因未見記載。

威廉.巴特海軍上校(1820 – 1857) Captain William T. Bate

威廉.巴特是二次鴉片戰爭期

間於廣州戰死的英國皇家海

軍軍官。1857 年 12 月 28

日，英軍從水陸兩路包圍廣

州，珠江河面被英艦封鎖，並

向岸上放炮。29 日，另有英軍於

小北門入城，然後攻佔越秀山，採取居高臨下之勢，控制全城。



威廉·巴特是在攻城時找尋放置雲梯之際被炮彈打中殞命，終年 37 歲。為紀念巴特上校，有關人士於香港聖約翰座堂北壁嵌了一塊紀念碑，記述其遇難經過。

香港墳場內體積最巨大的紀念碑，多與第二次鴉片戰爭有關，當年參與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各場戰役的多艘艦隻，均有紀念其死難將士的石碑，其中包括旗艦“加爾各答”號。

“加爾各答”號官兵紀念碑 The Monument to the men of HMS Calcutta

“加爾各答”號是海軍少將西摩爵士的旗艦，該艦載重 2,299 噸，於 1831 年在孟買船塢興建，由於積龐大，不能駛進珠江，故只寄碇於虎門河面，向虎門炮台發炮射擊。廣

州陷落後，該艦參與了華北的戰役，停泊於大沽口對開的白河口。“加爾各答”號官兵紀念碑體積巨大，上端作一倒置之大炮，造型突出，四壁刻上 50 個死者的姓名，他們都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戰或因病去世的士兵或軍官。

“西比爾”號官兵紀念碑 Monument to the officers of HMS Sybille



“西比爾”號載重 1,633 噸，於 1847 年在彭布克船塢興建，它裝有 36 門 32 磅大炮，艦上有 8 名軍官及 153 名官兵，參與了 1867 年 12 月的攻佔廣州之役，墓碑上的愛德華·洛特(Edward Loft)，正是在 12 月 29 日一役陣亡。“西比爾”號官兵紀念碑折口圓柱形，象徵生命驟然結束，下部飾以繩纜紋，其下為一底座，刻有該艦死難官兵 21 人之姓名，其中有於香港染病去世，亦有在二次鴉片戰爭的戰役中陣亡者。



“南京”號官兵紀念碑 Monument to the men of HMS Nankin

“南京”號載重 2,540 噸，1850 年於伍爾維奇船塢興建，裝有 44 門 32 磅大炮，艦上有 9 名軍官及 208 個官兵。紀念碑造型作歌德式四角尖頂狀，東壁刻有：“‘南京’號的艦長、軍官及海軍紀念其死難同袍”、南壁刻上該艦參與之戰役之名字：“虎門炮台 1856 年 11 月 12 日；佛山河 1857 年 6 月 1 日；西樓 1857 年 12 月 15 日；廣州 1857 年 12 月 28 日及 29 日。可知，“南京”號曾積極參與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多場戰役。

“桑普森”號官兵紀念碑 Monument to the men of HMS Sampson

“桑普森”號官兵紀念碑紀錄了“桑普森”號 20 名士兵的名字，均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役中陣亡。“桑普森”號是一艘輪動的木製快速帆船，載重 1,299 噸，1844 年在伍爾維奇船塢興建。該艦的編制 3 名軍官及 48 個官兵。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之初，1856 年 10 月便投入戰役，參與襲擊虎門塔台，繼而駛廣州，在珠江上向兩廣總督衙門發炮。1857 年 1 月，該艦受到一隊清水師戰船的攻擊，而有所傷亡。

除上述各艦的陣亡官兵外，香港墳場內還有曾投入第二次鴉片戰爭從廣州到北京各場戰役的 51 名陣亡英國皇家海軍陸戰隊的軍官、號兵、二等兵及皇家海軍陸戰隊的砲兵連未受任命的軍官及砲兵的紀念碑。更有曾參與清剿海盜的哥倫賓號 (HMS Columbine) 陣亡軍官紀念碑等。



何顯理女士 (1817 – 1844) Mrs . Henrietta Hall Shuck

何顯理是首名來中國傳道美國女傳教士。何顯理 1817 年生於美國維琴納州瑪諾市，14 歲入基督教，少懷出國傳道壯志。1836 年，下嫁叔末士 (Rev. J. Lewis Shuck)，雙雙立志東來傳道，航行一萬七千多英里，歷時七個月，於次年 4 月抵新加坡。兩人在新居留 5 個月，學習中國語言，並等候美國浸信會傳道部之指示。1836 年，他們抵達澳門，翌年，叔末士首次為華人施浸禮。



1841 年香港開埠，叔末士夫婦及早前抵澳的另一位美國傳教士羅孝全牧師 (Rev. I.J.Roberts) 聯袂遷往香港，自由傳播福音，同年成立了皇后大道浸信會。何顯理自澳門來港後特別關注兒童教育。1844 年她開辦膳宿學校，學生人數在短時間內由 15 人增至 50 人，叔末士夫婦每天辛勤講道，何顯理在 1844 年 11 月 27 日於分娩時去世，年僅 27 歲。遺體下葬跑馬地墳場。1936 年，兩廣浸信會在廣州舉行浸信會在華成立百周年紀念會，以紀叔可二人來華傳道。議決在香港成立紀念學校，

推定香港浸信會主持其事。1951 年，把原來的浸信會小學正名為顯理中學至今。

郭士立牧師 (1803 – 1851) 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郭士立，普魯士人，生於 1803 年，早年矢志傳教，曾先後於鹿特丹、巴黎學習馬來語、阿拉伯語及土耳其語。1827 年抵達爪哇，輾轉在暹羅居住了一段時間，並掌握了普通話、粵語及福建話，還學會了書寫中文。在暹羅，郭士立歸化為中國籍，並取了“郭姓”。他對中國產生濃厚興趣，決心來華傳教。



1831 年，郭士立抵達澳門。翌年，他以翻譯員身分隨同“亞美士德號輪”在中國沿海進行考察。未幾，他接受了威廉·渣甸的邀請在一艘鴉片貨船上工作。1834 至 1839 年，郭士立在駐華英國商務部任翻譯員及副書記。在鴉片戰爭期間，郭士立擔任總翻譯員。1843 年馬儒翰染病去世，郭士立繼任為駐華英國商務部之總書記，擔任首任香港總督璞鼎查的中文秘書及撫華道。

在香港，郭士立大力開展其傳教工作，1844 年設立了福漢會，訓練華人到內地傳教，郭氏為擴張傳教效益，曾分函歐洲各差會，多派教士至本港與廣東，向本地與客屬人士傳教。1847 年，巴色會(崇真)及巴冕會(禮賢)派遣教士來港，是為德國傳教士來華之始。但郭氏所立之教會，工作草率，人品混雜，傳教之方法及效益也受到本港其他基督教組織之批評，1848 年他返歐洲尋求援助不果，1851 年 8 月 9 日，郭士立病逝於香港，享年 48 歲。

韓山明牧師 (1819 – 1854) Rev. Theodor Hamberg

韓山明牧師是巴色會(今崇真會)來華首批教士。為響應郭士立的號召，巴色會在 1846 年決定差遣教士到中國傳教。韓山明與黎力基於 1847 年 3 月抵港，在郭氏安排下，他們學習中文，穿華服，留髮辮，每天學習漢字三百個，其中黎力基負責潮語區，韓山明負責客語區，於沙頭角之寶安、布吉等地傳播福音。1851 年，韓氏在上環街市鄰近設立了巴色會的禮拜堂。翌年，在西營盤成立教會(今崇真會救恩堂)。1854 年，韓牧師辛勞過甚，染病去世，年僅 35 歲。



威廉·奧利斯·哈蘭醫生 (1819 – 1858) Dr. William Aurelius Harland

哈蘭醫生來自英國一個醫生世家。其父威廉·夏倫是當地名醫，也是蒸汽機發明先驅，與發明火車的喬治·史提芬遜稔熟。奧利斯·哈蘭醫生 1822 年生於英國斯卡巴勒；1844 年畢業於愛丁堡大學醫學院。1847 年來港，在海員醫院(Seamen's Hospital)行醫，翌年，他在香港為病人施手術時首次以哥羅芳(三氯甲烷)進行麻醉；哈蘭醫生是郭士立牧師的好友，對中國文化及中醫藥均有所認識，他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會刊發表過不少介紹中國人體解剖學及生理學的文章。

哈蘭醫生也是一名業餘植物學家，他搜集了多種中國植物並為之分類。哈蘭醫生後擢昇為總醫官，1858 年，他因替貧苦華人診治而染上疫症，死於任上，享年 39 歲。香港早年疫症肆虐，衛生情況欠佳，歐洲人在港死亡率甚高。據知在 1843 年高竟達百分之二十二；在香港當總醫官風險甚高，除哈蘭醫生以 39 歲之齡染病死於任內外，其墓旁的另一座墳墓 - 紀念



威林·馬禮遜醫生，1847 年至 1848 年任總醫官，1853 年死於任內，終年 41 歲。

高和爾(或稱高三桂及高露雲) (1816 – 1875) Daniel Richard Caldwell

高和爾是一位混血兒，1840 年隨英軍從新加坡來港，藉著熟諳多國語言，包括粵語，成為開埠之初香港政府倚重之才。高和爾從傳譯員開始，1846 年擢昇副警察司，未幾因欠下債項被捕，旋復任，因提供海盜線報立下大功，晉昇為總登記官及華民政務司。不久，又因被發現與海盜黃墨洲有連繫而遭研訊，幾經波折，被港督羅便臣辭退。高和爾在任內包娼庇賭，貪污枉法，正反映了香港開埠初期吏治之敗壞。



他是基督徒，也是共濟會的成員，其墓碑刻上共濟會之標志，成為明證。三桂太亦葬於墳場的另一角落。現代共濟會出現於 18 世紀西歐，自從 1717 年成立英格蘭第一個總會所，至今其已經遍布全球。會員包括眾多著名人士和政治家，有些要求申請者必須是有神論者，有些則接受無神論者申請。

高三桂太太 Chan Ayow

高和爾之妻，於 1850 年受洗加入倫敦傳道會，後加入華人自理會，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據知她曾收留多名女童作家人僕從，並為其安排結婚對象，關元昌之妻黎氏即其一。

高和爾在 1875 年病逝，高三桂繼承了其夫遺下之物業，以原價七萬元的半價出售予倫敦傳道會，後來在該址上興建了雅麗氏利濟醫院(附西醫學院)及道濟會堂。為孫中山早年求學及做禮拜之處。



佛德烈.史釗域博士 (1836 – 1889) Dr. Frederick Stewart

佛德烈.史釗域博士是中央書院(後易名皇仁書院)創校校長，有“香港公立教育之父”的美譽。史釗域是蘇格蘭人，早歲畢業於鴨巴甸大學，修讀神學。1862 年，由香港教育諮詢委員會主席雅理各按照英國文法中學模式所籌劃的中央書院成立，



公開招聘校長兼政府監督學院一職，其時港府有意推行“教育世俗化”，並藉開設中央書院以落實此一理念。24 歲的史釗域以“年青”，有良好教育背景，對教育熱誠，獲委任從英國來港蒞任。

中央書院早年的課程包括：中英文、算術、歷史、地理、代數、幾何等科目，特別重視英語教學，開辦後廣受本港華人的歡迎。史釗域在中央書院的年報中指出：“中央書院相當成功是因為英語可以變為港元。”中央書院的畢業生不少回國服務於海關，史釗域認為這樣“間接的好處顯而易見”香港政府具有更高的目標，教育不過是實現言一目標的媒介”換言之，就是透過為香港的華裔學生提供教育，擴大英國對香港的影響。

何啟、胡禮垣、韋玉、何東等香港及中國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都是史釗域擔任校長期間的中央書院畢業生。另一方面，史釗域作為政府監督學院，在 1873 年取得教會合作，制定津貼計劃，邀請學校加入。1881 年史釗域離開了在職 19 年的教育崗位，改任警察裁判司，未幾更升任總登記官(華民政務司)，最後擢昇為輔政司，1889 年，史釗域去世，下葬於跑馬地香港墳場。

楊衢雲 (1861 – 1901)

楊衢雲，晚清革命家，烈士。他是香港第一個論政團體“輔仁文社”的創立人及會長；革命團體興中會的第一任會長，早年與孫中山齊名，參與過兩次武裝起義，後為清政府派人所暗殺。楊衢雲的墓碑是香港墳場中有名的無字碑。楊衢雲，字飛鴻，字肇春，衢雲為其號，原籍福建海澄，其父早年旅居於檳城，後移居香港。楊衢雲出生於東莞，早年在香港海軍船塢學習，後因意外斷指，改入聖保羅書院肄業，卒業後，先後任聖約瑟書院教員、招商局書記及沙宣洋行副理。楊氏習武術，性格“任俠好義”，

1892 年，楊衢雲與好友謝纘泰、尤烈、黃詠商等組成了以“砥礪品行”、“盡心愛國”為宗旨的“輔仁文社”。該年秋天，楊氏經尤烈的介紹與孫中山相識，一見如故。1895 年，孫中山在香港組成“興中會”，楊氏解散輔仁文社與之合併，乃被推舉為興中會首任會長，旋部署發動第一次起義 - 廣州乙未起義，楊衢雲負責在香港籌集經費，購買軍械及招募廣州地區的志士。



乙未起義因事洩流產，革命黨人被通緝，楊衢雲輾轉經新馬遠赴南洋，仍然傳播革命思想。

1898 年，楊衢雲赴日本與孫中山會合，再謀舉義，並把會長一職讓與中山先生。1900 年，革命黨人在惠州三州田發動起義，楊氏負責餉械接濟，起義因後援不繼而告失敗，起義者分散各地，楊衢雲堅持留港，以教英文為生。1901 年 1 月 10 日，楊氏於結志街 52 號 2 樓為清廷所派之刺客所殺，由其好友陳少白、謝纘泰等奔走，得以下葬香港殖民地墳場，墓碑是香港親友捐資所建。

1898 年（光緒緒廿四年戊戌）六月，謝纘泰他繪製了一幅東亞時局形勢圖。圖中，以熊代表俄國、犬代英國、蛙代法國、鷹代美國、日光代日本、腸[蛇]代德國。圖旁題辭：「沉沉酣睡我中華，那知愛國即愛家，國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洪春魁 (1836 – 1904)

洪春魁，字其元，後易名全福，洪秀全從姪，幼隨洪秀全起義，功封瑛王，三千歲。太平天國敗亡後，逃難香港，在洋輪上當廚師，後隱於香港，懸



壺問世。查謝纘泰自楊衢雲死後，常思為故友復仇，得其父日昌之介紹，認識洪春魁，乃密謀起義，號召各地洪門響應。時香港富商李陞之子李紀堂剛繼承了遺產數十萬，乃慷慨捐出 50 萬作起義經費。

據知參與其事的尚有香港紳商何啟、何東、劉鑄伯等人。黨人設機關與香港德忌笠街 20 號 4 樓，名曰“和記棧”，又以李紀堂名下的青山農場，為黨人的軍火試驗場，計劃除夕省城各大小官員齊集城南萬壽宮行禮時一舉炸毀之，然後佔據軍械局、火藥庫、乘亂分頭佔據各衙門，宣佈為大明順天國，並密議事成後舉容閱為臨時大總統。

韋安 (1867 – 1907)

韋安，韋光之子，韋玉之弟，中山人，父韋光，早歲於澳門行乞，為傳教士裨治文收留，於馬禮遜教育學會就讀；後遣往新加坡繼續學業。返港後，曾先後於 Bowra 洋行當買辦及在高等法院當傳譯。1857 年，有利銀行在香港開設買辦之職位，韋光被聘為買辦，直至 1878 年去世，其有利銀行買辦之職位，為其長子玉(寶珊)所繼承。



韋寶珊，韋光之長子，於其父死後繼任有利銀行買辦；1887 年任東華醫院主席，1896 至 1917 年間為立法局非官守華人議員，香港華人社會領袖，1919 年獲封為爵士。韋安是韋光第二子，又名華安，現存有關韋安的資料不多，從墓碑所記，他早年曾就讀於英國切爾勝納姆學院，後於牛津大學的基督學院肄業，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先後在英國及香港的高等法院任大律師，1907 年去世，享年 40 歲。

蔡立志 (1859 – 1909)

蔡立志生於馬六甲，其家族於第四代前從福建移居該地，為當地著名殷商。蔡立志早年於新加坡求學，1874 年來港發展，加入中華火車糖廠(China Sugar Refinery Company Ltd.)當職員，因工作勤奮負責，獲擢昇為該公司之買辦。蔡氏曾任多間公司之董事，為香港、爪哇及中國之間糖業貿易之翹楚。

他熱心公益，在香港的華人社會中享有盛譽，曾擔任雅利氏利濟醫院、那打素醫院、香港園藝會及颱風救濟基金會委員等多項公職。蔡氏對園藝頗有心得，其孫蔡永業是香港名醫，曾任香港醫務衛生署署長，是中文大學醫學院創院院長。



關元昌 (1832 – 1912)

關元昌是中國牙醫先驅，道濟會堂長老。其子景良是孫中山先生求學時期的摯友，孫中山與關家關係密切。關元昌，廣東番禺人，出身於基督教家庭，其父關日是梁發的十個信徒之一。關元昌早年在倫敦教會所設立的英華印刷館工作，因年少聰慧，工作勤懇，為西教士賞識，授以西式鑲牙技術。1870 年在廣州執業，子女稍長後回港定居行醫。



據說關元昌是第一個華人註冊牙醫，故有“中華牙醫鼻祖”之美譽。關黎氏，南海西樵人，廣東紅兵之亂，黎氏逃難途中與家人失散，為高三桂太太所收養，及長，安排與關元昌成婚，於雅麗氏醫院當傳譯(或謂當護士長)，並於英華女校任教。關元昌伉儷共育子女 15 人，大多從事醫務工作，是本港有名的醫學世家。

關元昌的七男景良，號心焉，1887 年入讀剛創校的香港西醫書院，與孫中山先生是同窗，居於學校校舍。孫中山先生暇時常往關家作客，尊元昌及黎氏為誼父母。關景良因受父母反

對，故後來並未參與興中會的革命活動；但與中山先生關係密切。其妻李月娥為夏威夷華僑，亦為孫中山所介紹，中山先生更在婚禮中當證婚人。關景良後成為一代名醫，並且創立了中華醫學會，也是養和醫院的創辦人之一。關景良的元配李月娥夫人卒於 1905 年，享年 30 歲，亦葬於香港墳場。



何啟爵士 (1859 – 1914) Sir Kai Ho Kai

何啟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其父何福堂是香港最早的牧師，家庭背景與當時大部分港人迥然有異；他中學就讀於當時香港唯一雙語教學的中央書院；其後負笈十年，先在鴨巴甸大學取得醫學學位，繼於倫敦的林肯法律學院獲得法律學位，學歷冠於同儕。何啟的家庭出身及教育背景做成了他非常西化的生活習尚，他穿西服，娶雅麗氏 (Alice Walkden) 結婚，信西教，講英語，在 19 世紀晚期找不到第二位。



因此，何啟返港後不久，便受到殖民地政府的賞識和器重。

1890 年，他以 31 歲之齡接替年逾花甲的黃勝出任立法局議員，並前後在位 14 年，歷仕六任港督，1912 年更被冊封為爵士，成為首名封爵的華人。何啟對本港的醫療及教育貢獻良多，為紀念亡妻雅麗氏，他創辦了香港雅麗氏利濟醫院，並附設了香港西醫學院，孫中山先生正是首屆畢業生。1909 年，何啟任香港大學助捐董事會主席，1911 年，香港大學創校，何啟功勞不少。

何啟雖生長於香港，但仍心懷祖國，他有感清廷腐敗無能敗與好友胡禮垣發表一系列論政文章，力主政治改革，廢科舉，實行君主立憲，對包括孫中山在內的晚清知識分子影響很大。1895 年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部署起義，得到何啟暗中支持為廣州起義起草宣言，及指示外籍記者於西報上撰文，支持革命，為起義鋪路。1900 年，義和團肆虐華北，李鴻章在南方實行“東南互補”，在港督卜力支持下，積極拉攏孫中山與李鴻章合作，佔據兩廣獨立，終因李鴻章決意北上而告吹。

辛亥革命成功後，何啟被委任為革命政府總顧問官協助起草憲法，正由於何啟積極投身廣東的政務，受到港府的猜疑，1913 年 8 月，港督梅軒利向英廷建議不再續任已連任四屆的何啟為立法局議員。翌年，何啟逝世，享年 55 歲。

溫清溪 (1834 – 1915)

溫清溪原籍廣東台山，20 歲時到港經商，隨理雅各學道；1864 年受洗，1872 年受按為倫敦會執事。華人信徒自理構想下成立的道濟會堂、公理堂及禮賢會，溫氏均為主要人物。孫中山先生受洗的公理會或謂即為溫清溪名下物業。溫家與關元昌家族同為香港有名的基督教世家。溫清溪晚年與關元昌、王元琛、吳秋湘、區鳳墀及胡禮垣並稱「香港六老」，並於 1910 年發起“剪髮不易服會”，既保留中華服飾，卻要剪掉象徵滿清統治的髮飾。



吉席.保羅.遮打爵士 (1846 – 1926) Sir Catchick Paul Chater

遮打是亞美尼亞商人，1846 年生於印度加爾各答。早年父母雙亡；1864 年來香港投靠其姐及姐夫，最初於興都斯坦銀行當文員。1866 年他辭去銀行職位改當經紀，逐漸建立了廣潤



的商業網絡，及投資地產發展，在 1886 及 1889 年，他先後創了和富及置地兩間大企業；隨著社會地位的提升，港府委任他為立法局(1887)及行政局(1896)議員；倚重有加。

1887 年，因擁有沿岸業權的大商行反對而擱置多年的中環填海計劃在遮打的大力推動下正式開展，這是中環的第一次大規模填海，1930 年竣工後，海旁從德輔道延伸至干諾道，中環增添了 57 英畝用地，新填地上陸續興建了高等法院大樓、香港會會所及皇后像廣場，中環面貌煥然一新。

何東爵士 (1862 – 1956) Sir Robert Ho Tung

0 何東，原名啟東，字曉生，是 20 世紀上半葉香港最富有及最具影響力的商人。何東是混血兒，其父為英籍荷蘭裔商人 Charles Bosmond，其母是寶安縣人。



何東少就讀於書塾，12 歲入中央書院，畢業後，先留校當助教，繼任職海關，後加入財雄勢大的怡和洋行，由初級經理做起，最終擢升至華人總經理。在多年買辦生涯中建立了廣闊的商業網絡，也積累了大量資本；1900 年以健康欠佳退職，開始全力發展自己的事業。何東長袖善舞，眼光過人，在貿易、

航運、金融及地產投資上，發展順利，迅速成為香港首富。

華人血統的何啟西服革履，但身為混血兒的何東卻以華人自居，赴英國出席重大場合，也一樣長衫馬褂。1898 年他出任東華醫院主席，成為名符其實的華人領袖，翌年，更創立了華商會所，成為首任主席。何東熱心公益，一生捐助各種慈善及教育事業；如 1902 年捐款成立九龍英童學校；1911 年香港大學成立，何東是主要捐助人之一；1914 年歐戰爆發，何東向英國捐贈了兩架飛機；1936 年日軍侵華前夕，他捐出十萬大洋，給中國購買戰鬥機。何東一生擔任公職不多，但因慷慨捐輸，故英廷先後頒予英皇佐治五世爵士勳章及英女皇 KBE 爵士勳章，更獲准在山頂居住，成為最早在山頂居住的華人家庭。

何東既自視為華人，故對中國事務也異常關注，1895 年戊戌政變失敗，康有為逃港避難，為何東收留，在何家住了半個月；1922 年，他協助調停海員大罷工事件；1930 年他鑒於中國軍閥割據，四分五裂，乃南北奔走，聯絡各軍閥，發起和平統一會議，更讓其子世禮投身軍旅，擔任國民政府之將軍，他對國家感情，可見一斑。何東第一位夫人是麥秀英，與何東結婚後並無所出。何東第二位夫人是麥秀英的表妹張蓮覺。何東於 1956 年 4 月 27 日以 94 歲高齡去世，臨終前接受基督

教洗禮，死後葬於香港墳場，在元配麥秀英之旁。

簡東浦 (1888 – 1963)

簡東浦，廣東順德人，出身於銀行世家。其父簡殿卿是橫濱正金銀行(東京銀行前身)香港分行的買辦。簡東浦早年肄業於皇仁書院，後負笈東瀛，懂中、英、日三國文字，先後加入日本神戶的橫濱正金銀行及國際銀行(花旗銀行的前身)，有感於外國銀行組織完備，乃決意回港創辦銀行以與外國銀行相抗衡。1916 年與劉鑄伯開設德信銀號，1919 年與友人李冠春及子方昆仲創辦東亞銀行，並任永久董事及總司理之職，直至去世。



簡氏為本港銀行業的巨擘，從 1949 年至去世為止，是香港銀行業諮詢委員會中，首位及唯一的華人委員，對香港銀行業的發展，貢獻良多。簡東浦共有 14 名子女，其中不少均能克紹箕裘，獨當一面。簡悅強主要從事法律及銀行業務，曾出任東亞銀行主席達 20 年之久。簡悅強積極出任多項公職，曾任立法局及行政局首席非官守議員，更獲封為爵士。簡悅威是國際內分泌學權威，是首屆邵逸夫醫學獎得主。

從 1878 年開始，在港去世的日本人或葬於咖啡園墳場，或零星的葬於香港墳場，與基督徒的墳墓混雜一起。隨著日人墓穴的增加，英國人對於他們的拜祭儀式，特別是焚香深表不滿，經過潔淨局及立法局的一番討論，終在 1909 年通過條例，把墳場一角，闢作非基督徒墓地，爭議告一段落。

在明治初年日本政府撤銷了國民渡航海外禁令，特別是在 1902 年《英日同盟》結成後，來港日本人日漸增多。日本人在港經營服裝店、美容院、照相館、飯食店、旅館、診所等，但為數最多的是賣來香港當娼妓的日本女子。

其他紀念碑

香港及九龍市區內曾豎立過若干石碑，以紀念某些歷史事件，多少年來，成為該地區一大地標。但隨著市區發展，當局須擴闊馬路面以疏導日益繁忙的交通，這些石碑乃難逃被一一移走的命運，而香港墳場便最終成為其藏身之處。



Fronde 號紀念碑 (圖左)

此紀念碑原豎立於加士居道與佐頓道交界，毗鄰拔萃女書院，乃由香港的英裔社群捐建，以紀念法國佛羅德(Fronde) 號魚雷艇上的 5 名英勇法國人員，在 1906 年 9 月 18 日颱風襲港時，因拯救平民而捐軀。這是香港歷史上破壞力最大的颱風之一，在沒有任何預警之下，香港受到一股強烈颱風正面吹襲，死傷數以千計，沉船無數，經此一役，政府乃決定興建避風塘。

HMS.Vestal 號紀念碑 (圖右)

此石碑原位於皇后大道東與禮頓道交界處(前新華社香分社對開)，多年來是跑馬地重要地標。石碑是 1847 年 3 月由塔爾博特(Talbot) 艦長及維新塔爾號 (MHS.Vestal) 的長官及其他成員所立，以紀念死去的同胞。查該艦從 1845 至 1847 年先後在錫蘭、馬德拉斯、香港及汶萊等地服役，在汶萊更參與過清剿海盜的戰役。石碑紀念的既有在該戰役戰死將士，也有在駐守不同城市期間染病或因意外喪生的同胞。

清剿海盜及遇難軍官紀念碑

此石碑原位於禮頓道，在 1950 年年代被移往香港墳場安放。香港開埠初期，附近地區海盜非常猖獗，1855 年，英國與美國艦隊採取聯合行動，於澳門西南之高瀾島清剿海盜，此石碑

乃為紀念戰死的 4 名英國及 5 名美國船員而立。此紀念碑見證了香港開埠初期，鄰近地區海盜之猖獗，曾是香港早期航運發展之一大障礙。

全文完

參考資料 跑馬地香港墳場初探 丁新豹院士